

# 传 播 论 稿

郭镇之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传播论稿

郭镇之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mm 印张: 9.25 字数: 226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1004-741-8/G·386

定价: 17.00 元

# 前 言

这是本人研究广播、电视和新闻、传播的文集，为简要起见，以“传播”一笼统之。

我1979年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批研究生（总共两人）之一，从此涉足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光阴如箭，倏忽已有十数年。在我虽不算长、也已不短的学术生涯中，有几个对我影响至深的单位是必须提及的。

第一个自然是广播学院。广播学院是我学术上起步的地方。我最初师从赵玉明老师，研究中国广播史，从此入门，培养了对历史的热爱，对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北京广播学院给了我一般学子难以期望的宝贵机会，使我成为中国广播领域最早的硕士之一。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对新闻学和传播学学术的了解是很肤浅的，我的研究方法也基本是传统的。

1985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8年成为新闻学院），成为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第一批博士生之一。我的学术生涯进入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阶段。在致力于中国电视史研究的3年时间里，我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史学、特别是对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我不再仅仅满足于解答“怎么样”的提问，还想追问、并不断追问——“为什么？”——“又为什么？”

博士生毕业后，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学术空气相当开放、理论思维非常活跃、经济上却相对清苦的地方。寂寞的书斋环境给予我潜心读书的机会，研究者讨论切磋的风气培养了我对理论探索的兴趣。从本性来说，我是更加喜爱研究工作的。当我重新执掌教席时，我仍很怀念那种表面清

静、内里活跃的生活。

当然，校园生活、特别是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也深深吸引着我。作为一名主要以广播电视为对象的研究者，我希望与这个行业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因此，1994年，我又回到了广播电视教学岗位。

结集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在以上三个时期形成的。我希望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同时，我也希望以这些研究作为今后教学的基础。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历史，其次是理论。在历史中，分史述与史论两个部分，以区分不同的层次；在理论中，有学术性较强的对受众和体制的研究，也有与理论方法有些关系的理论性探讨和节目评论。

就学术思想而言，我侧重于历史叙述与历史分析。我发现，要作历史课题的主人、而不是作既往历史的奴隶是太难了。但，也许这正是传播历史学者的责任所系与机遇所在。

正由于历史学者的特点，我对理论的关注也是历史思路的——批判的、选择性的兼收并蓄。我为许多理论的洞察力和启示性所倾倒，但并不执着于某一传播理想。我不大相信完美，尤其是对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可以说，我不是某一传播理论的传教士；只是许多思想的鉴赏者或者介绍者。

本书中出现的文章都是发表过的。此次出版尽可能作了一些修改，以求改善。若干年后回头来看自己过去的工作，心情是复杂的。虽然有时也惊奇于自己在某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但可以说，不满意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学术的规范性方面。毕竟，研究也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我期待着学界对这一并不成熟的“过程”的批评。

作者

1997年6月20日

# 目 录

史述	
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考.....	(1)
论旧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兴衰 .....	(12)
史论	
论修当代新闻史 .....	(58)
情感与经验	
——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 .....	(69)
附录 1：传播历史研究的本质 .....	(95)
附录 2：传播历史研究法 .....	(117)
论说	
视听者权益散论.....	(134)
媒介崇拜与经验认同	
——《渴望》受众来信分析.....	(144)
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	(159)
商业广播电视辩证.....	(171)
市场经济中的广播电视.....	(185)
商营政策比较：CBC 与 CCTV .....	(198)
评说	
关于电视剧的评价	
——也谈平庸.....	(234)

## 对电视纪录片的思考

- 从《最后的山神》说开去..... (243)

## 社会讲坛

- 试析《午间半小时》..... (257)

## 开拓广播电视研究的新思路

- 研究方法及理论评价片论..... (265)

## 评奖归来话广播

- 法制、经济与广播竞争..... (279)

## 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考<sup>①</sup>

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是外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创办的，这一结论有关史书和文章多有记载，似无异议。但是，过去对这个电台的具体情况语多参差，常常有不确切、甚至错误的地方，有必要搞清楚，使人们对中国广播历史上因首创而显示重要性的这一电台有明晰而正确的印象。

对于奥斯邦办的这个电台，笔者首先是从1938年8月出版的《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刊载的《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这篇文章中得知大概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胡道静先生写道：“在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的冬天，有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名字叫奥斯邦（Mr. E.G. Osborn），一向留在日本，结识了一位很有资产的留日华侨张君，他就劝张君在中国筹办广播事业，得到张君的赞同，遂以华人的资本，假外人的名义，在上海大来洋行的屋顶上造了一个五十瓦特的广播无线电台，同时组织一个中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发售收音机，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时开始播音。这是上海也是全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无线电台，……”<sup>②</sup>胡先生这段话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惜乎语焉不详，且后来证

① 原载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胡道静：《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载于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259至26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60页。

明也有不正确之处。

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是刊登在 1924 年 9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 21 卷 18 期上曹仲渊先生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和成书于 1926 年，1936 年 11 月由交通史编委会出版的《交通史·电政篇》。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发表的关于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的专文或章节，则基本抄自前人，陈陈相因，甚至有因完全不了解历史事实而抄错了的。

笔者近年来因一个相关的课题翻阅了大量的报刊、档案，特别是作为第一手资料的 1922 年至 1923 年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获得了关于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的相当具体的原始资料，可以澄清一些疑问。现特提出，以就教于有识者。

## 一、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的开办

胡道静先生在《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奥斯邦创办的电台“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时开始播音。”笔者以此为根据进行查证，发现这个说法比实际开办时间晚了一天。这个电台正式开办的日期应是 192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晚 8 时开始广播。《大陆报》对此有好几次详细记载，如 1 月 21 日的预告、1 月 23 日当天的预告和 1 月 24 日的报道。因为《大陆报》是该电台的当事人之一（电台是由《大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合作创办并经营的），报上的消息又是当时的记载，所以十分确凿可靠。此外，《申报》、《新申报》等事前事后也有报道可作旁证。开办日期差了 1 天，虽属小小的失误，但传抄至今，应予订正。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奥斯邦的这个电台是 1922 年 12 月开办的。首先是《交通史·电政篇》中指出：“十一年（1922 年）十

二月，有曾某与上海西人奥士篷（Osborn）于大来公司楼上创设广播无线电站，电力五十华脱（Watts），每日于一定时间传播音乐并出售收音机。”<sup>①</sup> 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保丰在其《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一文中，重复了这一说法。<sup>②</sup> 1966年曾虚白主编、台湾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一书中则将电台一分为二，分明写道：“其最早者可追溯至民国十一年美国商人亚司篷（P. Osborn）于上海创设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一座，电力50瓦，因音质不良，三个月后即行停播。”“民国十二年一月，亚斯篷又在上海其经营之大来公司楼上私设广播电台一座，且与上海《大陆报》合作，广播其新闻。上海市府以其未经政府发给执照不准播音，经交涉后决定出资收买，予以拆卸。”<sup>③</sup>

感谢《中国新闻史》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大陆报》这个关键的线索；但以上引文至少有4处错误：1. 大来公司不是奥斯邦经营的。他经营的中国无线电公司只是租用了大来公司的屋顶，以便设立广播电台；2. 奥斯邦的名字 E.G. Osborn 误写为 P. Osborn；3. 对设台提出禁令的是北洋政府交通部等，而不是上海市府；4. 不是“出资收买”，而是由创办者自家拆卸了事。有关情况我们下面还要谈及。

奥斯邦在和《大陆报》合作之前，是否在1922年12月独自开办过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呢？答案是否定的。奥斯邦是1922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的，19日，《大陆报》首次宣布：专家说，“上海马上就要有无线电话（即广播）了”，并预告，“本

① 交通史编委会：《交通史·电政篇》（第三册），1936年11月出版，第13页。

② 吴保丰：《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出自《十年来的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第694页。

③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三民书局（台湾），1966年出版，第60页。

市一家新建公司的负责人 E.G.Osborn 愿意向我们讲话。”此后，12月31日和1923年1月7日，奥斯邦在《大陆报》上连续撰文，介绍无线电和广播的知识，但丝毫也未提及他办的电台，《大陆报》也无报道。直到1923年1月21日，《大陆报》才发出预告：“星期二为上海广播的无线电新闻和音乐节目”，此后，对其成功大吹大擂，称之为“时代的奇迹”。<sup>①</sup>显然，这一时期，电台已在筹建过程中，但尚未开办。说奥斯邦在1922年办了一个电台，是不合乎事实的。

那么，奥斯邦除了与《大陆报》合作外，是否还创办过另一个电台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在此之前，而是在此之后。1923年5月29日《大陆报》载文报道说，永安公司楼顶广播电台将于5月31日开始播音。<sup>②</sup>这座电台的监造者就是奥斯邦。其时奥斯邦已离开中国无线电公司和他亲自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就任英国资本的国有无线电局（National Radio Administration）的总经理去了。不过，永安楼顶的电台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开办，这和《交通史·电政篇》的记叙倒是一致的：“……奥斯邦又租用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另设二百华脱电机，名曰国有无线电局”，“交通部以其私设无线电违反电信条例，严词抗拒，交涉数月，始于十二（1923）年春间拆卸。”<sup>③</sup>这段公案在《民国日报》上有较详细的记载，不过拆卸的时间应在夏天而非春天，具体日期当是7月31日。<sup>④</sup>在春天停办的，则是奥斯邦以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身份与《大陆报》合办的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看来，《交通史·电政篇》的作者也没有把奥斯邦办过的两

---

① 《大陆报》，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

② 《大陆报》，1923年5月29日。

③ 交通史编委会：《交通史·电政篇》，第13页。

④ 民国政府交通部档案。又见《民国日报》，1923年7月26日、8月9日、10月4日。

个电台分辨清楚，而混为一谈了。

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办时间约两三个月，确切的停播日期已无可查考。大致情况，1月下旬至4月上旬基本是逐日广播，每晚8:00—9:00，1小时左右。一度提前至晚7:00开始，并在下午增设午茶音乐会节目，以满足一部分中国观众的需要。后改为不定期播音，不久即消失。

## 二、地址、名称、呼号、波长、发射功率

这座首创于中国的广播电台位于上海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屋顶。这个地方是中国无线电公司向大来洋行租用的。因为是与《大陆报》合作开办，名称就是“《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The China Press - 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 Broadcasting Station）”。《大陆报》排名在前，并不说明它更重要一些，而可能是因为它的名称短些，按英文的行文习惯如此安排。事实上，中国无线电公司在办电台的整个过程中显然居于主导地位。奥斯邦不仅负责技术工作，也不时地在广播节目中出现。所以，有时也称“中国无线电公司——《大陆报》广播电台”，有时更简称为“《大陆报》电台”。电台呼号XRO。（为简便起见，本文以下就称之为XRO电台），波长200米，发射功率报上未载，《交通史·电政篇》和胡道静文皆称50瓦，可信。据《大陆报》报道，北京、南京、沈阳、香港、天津和日本神户等地均可接收XRO电台的广播，可能因为当时电波干扰较少之故。

过去，称XRO电台为“奥斯邦电台”，不准确；说它的呼号是E.G.O.或者ECO的，想是将奥氏的姓名缩写误为呼号，进而传抄失误所致。

### 三、XRO 电台的主办人

最先起意创办广播电台的应是奥斯邦。1922年12月，他一抵达上海，便向《大陆报》宣布，上海马上就要有无线电话了。两家的合作即开始。发射机由美国运来，电台是由奥斯邦安装和操作的，《大陆报》的广播编辑主要负责新闻报道。编辑似乎是固定的一人，但从未公布过姓名。

《大陆报》1911年8月创办于上海，长期以来是租界美国人的喉舌。其实它最初是由孙中山、伍庭芳、唐绍仪等人筹资，委托美国友人创办的，目的是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英文日报，只是因为辛亥革命很快爆发，孙中山等人不暇顾及，才使《大陆报》变成纯粹外国人的报纸。但它之具有亲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倾向则不言而喻。XRO电台创办伊始，便于1923年1月25日广播了孙中山的《统一宣言》，并曾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大陆报》于1月27日详细报道了这一事情，《民国日报》也有记载。<sup>①</sup>《大陆报》的记者、编辑多是来自日本、檀香山等地的美国人，中国无线电公司与之合作，顺理成章。

中国无线电公司是奥斯邦创办的，从属于东方无线电公司。奥氏原是东方无线电公司的人。他的国籍，有说“西人”，有说“美人”，其实并不矛盾。“西人”不过是外国人或“洋人”的别称，而“美人”则更确切了。至于他的职业，一说是“新闻记

---

<sup>①</sup> 《孙逸仙博士祝贺 大陆报 广播》，出自《大陆报》，1923年1月27日，转引自《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10页。

者”，<sup>①</sup>也有说是“商人”的。<sup>②</sup>从奥斯邦能操纵广播机器，以及熟练地排除故障来看，他应当是一位工程师一类的技术人员，或者按《大陆报》的说法，是“无线电专家”。但他既担任着一家商业公司的经理，似乎“商人”的身份也可成立。说他是“新闻记者”则缺乏证据。中国无线电公司的出资人或主人，《交通史·电政篇》说是“曾君”，胡道静则说是“张君”，上海话“曾”“张”音近，孰是孰非，尚待确证。不过，曹仲渊文也说是“曾君”，<sup>③</sup>因他成文最早（1924年），离事件最近（仅1年），故最为可信。而在80年代初我访问胡道静先生时，他告知，当时他撰写过许多掌故、史料性的文章，涉及面很广，大多根据的是资料，对于早期的广播史，他自己并未进行专门的研究考订，所以，如有错误，是可能的。

据《大陆报》报道，1923年3月21日，奥斯邦脱离中国无线电公司，接手的是美国工程师迪顿（B.C.R. Deaton）和上海的张先生（K.L. Chang）。<sup>④</sup>曹仲渊文中也有记载：“……未及四阅月，公司忽生内讧。奥士篷氏遂与脱离关系，而以一切事务归诸无线电工程师提敦氏及张君经理”。<sup>⑤</sup>内讧的原因，据传说是“奥氏曾因款项不清，交代为难，嗣后信用大失，不知所终。”<sup>⑥</sup>“张君”与前文“曾君”是否即为一入？曹文是否定的，区别为：曾为老板（即胡道静所说的出资人，或股东），张为经理（代理人）。可能胡道静正是把这个后来出现的经理“张君”认作了股

① 胡道静：《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第260页。

②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第60页。

③ 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出自《东方杂志》21卷18期，1924年，载于上海市档案馆等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55页。

④ 《大陆报》，1923年3月21日。

⑤ 提敦氏：即迪顿。

⑥ 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第55页。

东“曾君”。中国无线电公司的这位股东的情况至今是个谜，尚待进一步挖掘资料，予以考订。

#### 四、XRO 电台的影响

XRO 电台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广播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和关注。这种“无线电热”最初是在租界的外国人中间产生的，很快便传染到上海的中国市民。

XRO 电台不收广告费，除了作为收音机的招牌广告，似乎也未播放商业广告。它主要是以娱乐业的面目出现的。到电台表演节目的做法起初是自愿的和义务的，有点像俱乐部的性质。后来便需要团体赞助（出资，同时点播节目）。节目内容以音乐演奏和歌曲演唱为主，有时演出滑稽戏剧或安排专题娱乐活动，如林肯纪念日、美国大学生乡村俱乐部活动等，<sup>①</sup>后来还增设了每晚的故事节目。《大陆报》每天插播国际和本地新闻。星期日有布道、祈祷。还举办学术讲座，介绍无线电的基本常识。

XRO 电台以一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为后援。当时的“业余家”经常开展试验和技术交流活动，还组成了学术研究团体，其中最早的和最知名的一个是上海国际无线电协会（Shanghai International Radio Circle）。该会设于南京路 50 号美商新孚洋行内。<sup>②</sup>XRO 停办后，不久，新孚洋行于 1923 年 5 月 30 日开办了不定期的广播。<sup>③</sup>

XRO 电台的另一个支持者是美商开洛（Kellogg Switchboard

---

① 《大陆报》，1923 年 1 月 23 日、24 日，转引自《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 4 页至 10 页。

② 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转引自《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 40 页至 41 页。

③ 《大陆报》，1923 年 5 月 30 日，转引自《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 15 页。

and Supply Co.) 公司远东分公司。其经理迪莱 (R.E. Delay) 在上海经营无线电器材已历三载, 并获利不少。XRO 一成立, 他便表示极为满意。后来, 他于 1924 年 4、5 月间开办了开洛电台, 最初使用的, 就是原 XRO 电台的机件, 广播一直持续到 1929 年 10 月。在早期中国广播史上, 开洛电台是一座有较大影响的广播电台。

1923 年 3 月 3 日, 中国的“新世纪”乐队及其歌手首次 XRO 电台演播, 此后成为固定节目。中国听众也逐渐增加, 有与外国听众平分秋色之概。

## 五、XRO 电台的终结

胡道静先生在《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中指出：“我国政府向来对于私人装用无线电是禁止的，但是广播无线电或许因为是一种新的发明之故，奥斯邦所装的电台竟没有受到限制。可是收音机用的耳机，却因为那时候海关章程列在军用品内，禁止输入……既然没有东西可卖，哪能支持？何况他本来也并非无线电专家，所以他的事业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那位张君就此平白地损耗了数万元。”<sup>①</sup>

这一段话似可分析。

首先，北洋政府交通部的确是禁止（不仅仅限制）XRO 电台设立的。据 1923 年北洋政府交通部的一份档案揭示：“十二年（即 1923 年）三月十四日，本部咨外交部，请饬知江苏特派交涉员严行取缔上海西人所设之无线电学会及公司……”

沪西侨无线电公司

经理 美人 E.G. Osborn

<sup>①</sup> 胡道静：《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第 261 页。

事务 广东路三号大来洋行

电台 在该行屋顶上

……”

又，“十二年三月廿八日本部咨胶澳督办，不准装设无线电机”。<sup>①</sup>《交通史·电政篇》也有类似的政府反对的记载。<sup>②</sup>

其次，XRO 电台虽然受到来自中国当局的压力，但没有证据说明它是被迫关闭的。就在上述同一档案中，有“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撤销永安公司无线电机”的记载，却只字未提奥斯邦办的这座电台的结果，说明它不是被当局拆卸的，而且当时很可能已不存在。营业不利可能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曹仲渊在《三年来无线电话之情形》中指出，奥氏“因款项不清，交代为难，嗣后信用大失，不知所终。以致公司不能维持，宣告倒闭。该项播送机全副遂归曾君所有。此去年三月以后六月以前之事也。”<sup>③</sup>

奥斯邦即使算得上无线电专家，但一项新兴事业的创办，总有诸多不利因素，无论怎样高明的专家也不能担保它发展顺利。其中，有许多不是技术方面的原因，政府的贸易限制就是重要的一个。看来，XRO 电台原本是不甘于乖乖就范的，在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之下，它依然我行我素，有抗令不遵的迹象。目前查到的最后一次广播预告是在 1923 年 4 月 8 日的《大陆报》上。该报宣称，XRO 电台第二天将要为俭德储蓄会征求会员举办特别节目，4 月 11 日还要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无线电茶会。未发现该台停办的声明或消息之类。极可能的情况是，起先并未打算关闭，终因力不从心，时断时续，以不了了之。其时间，大约

---

① 民国政府交通部档案，转引自《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 40 至 41 页。此时，奥斯邦已经脱离中国无线电公司电台了。

② 交通史编委会：《交通史·电政篇》，第 13 页。

③ 曹仲渊：《三年来回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第 55 页。

是在 1923 年的 4、5 月间。其后永安公司和新孚洋行两处电台于 5 月底的筹备和开办，<sup>①</sup> 也反证出 XRO 电台，一是已不存在；二，不是被取缔的。

## 六、对 XRO 电台的评价

XRO 电台是外国人在中国擅自开办的，这对中国的电政主权当然是一种侵犯，至少是一种藐视。外国资产者的广播活动同他们的其他冒险事业一样，是以营利为目的，是以榨取中国人民为手段的。

不过，XRO 电台的出现，是以殖民主义者强行租借中国土地这一特殊的、也是既成的历史情况为背景的。广播的经营基本上限于商业和娱乐的范围。办广播电台在当时是一项新兴事业的试验活动，具有先进性、创新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是进步的。不可否认，正是 XRO 电台第一次把无线电广播这一新生事物带到了中国。它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它传布了新的知识，它刺激了中国民族无线电工商业的发展，并间接导致了中国人开办的广播电台的出现。

几十年后回头去看，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电台在中国广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sup>①</sup> 《大陆报》，1923 年 5 月 29 日和 5 月 30 日，转引自《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 13 至 15 页。